

一个跳高教练的生涯

作者：杨文永

(上接本报2019年1月4日第B4版)

九、大难临头

我大妹夫的父亲是上海有名的古董商人，在香港有分店。1959年，大妹夫被派去管理香港的古董生意，我妹妹也就随夫去了香港。因为需要从大陆进货，所以在六十年代初期，他们夫妇常常回上海买古董。每次回上海（那时从海外回来的人很少），他们总会带点东西给我们，其中衣服占大多数。我是家中的独生子，给的最多，也是最好的。穿着从香港带来的衣服，戴着在那个时代还不多见的进口墨镜，难免会引人注目，于是在破四旧时期，我就成了被批判斗争的对象。运动初期，就有人贴了大字报，批评我身为教练，却穿着“奇装异服”追求资产阶级的生活方式。看了大字报之后，我赶紧回家，把妹妹从香港捎来的时髦衣服统统处理掉，还穿上了简单朴素的衣服，这才相安无事过了关。但平时穿戴与众不同，难免会招惹群众的不满，随着运动不断向前发展，破四旧从街头发展到上门破四旧。没多久，由田径队红卫兵组成的一个战斗小组来我家，名义上是来我家破四旧，实质上是来抄家。他们翻箱倒柜，前后共折腾了约有四小时之久。我家早已没落，家中已无值钱的东西好拿，也没有什么封建迷信的东西。不过临走前，他们先把我饲养的热带鱼连同重达约五十公斤的鱼缸，从二楼的阳台上扔到弄堂内的车道上。沉重的鱼缸撞击到地面上，发出震耳欲聋的爆炸声，惊下了四周的邻居。他们这么做的理由是，“饲养宠物是资产阶级的产物，会使人玩物丧志，必须铲除”。随后他们又从我家拿走了三样东西：1) 一本电报密码对照表。那是解放前，由电报局出版的电报密码本，是我父亲与在厦门二伯父经商时，彼此传递贸易往来信息的电报解码手册，是从电报局买来的。2) 一台抗战胜利后美军撤退时，遗留下来的军用无线电收音机，当时是摆在四川北路的地摊上公开出售的。父亲图它便宜，就把它买回来了。二者联系起来，就成为能搞秘密情报的嫌疑物。从这点来看，我们不得不佩服这些革命小将的“丰富的想象力”，以及他们高度的“革命警惕性”。3) 一本小小的日记簿，里面记录着母亲从大伯父处收到定息的金额数。那是福建泉州市民生五金行公私合营后，人民政府发给我们家族的定息。大伯父按大家庭各户人

员计算，我家只能拿其中的六分之一。金额数每季度约人民币150元，但因过去做生意时，尚有欠款未付清，于是就从定息中扣除还债，所以每季度分到手款项是不同的。这也是我妈妈要记下每季度收到的金额数的原因。一般实际收入，一季度也只有五十元到二十元之间。这三样东西虽很不起眼，但却是可以定罪的证据。第二天上午，田径队的红卫兵把我叫去“钢筋铁骨造反兵团”的办公室问话。办公桌上放着从我家抄走的三样东西——电报解码手册、美国军用无线电收音机和领取定息的收据本。他们要我说明这三样东西的来龙去脉，我把所知的全都告诉了他们。最后他们要我伯父家的地址。当天的傍晚，他们又一次把我叫去兵团办公室。我一进门，只见办公室内站着五六个彪形大汉，其中两人是投掷运动员，他们手中各自拿着一根钢鞭。（在铁链条外，套上塑料套管的钢鞭）。田径队“钢筋铁骨造反兵团”隶属于上海体战线造反司令部（简称“上体司”），而“上体司”当时是上海市有名的“打手”组织。兵团的头头姓陈，一见我进办公室，不分青红皂白，勒令我面对着墙跪下。我只好跪下。随后他们审问我，除了工资的收入之外，有无其他收入？我说：“没有。”话音刚落，突然感到臀部与腰部有一种被撕裂的疼痛感，人即刻就跌倒在地上。姓陈的从桌上拿起一本账本给我看，那是我妈妈每次收到定息后给大伯父的收条，其中不仅有实际收到的金额数，更糟糕的是收据的下方，有我的盖章。（我的父亲于1957年去世，我是长子，顺理成章成了一家之主。大伯父执意每季度分给我家的定息，必须要我签名之后方可领取。当时我已搬进运动队，平时不在家，只有星期天下午才回家。于是母亲就为我刻了一枚木印章，来替代我的签名。领取定息过程的细节，我完全不知情。）显然当天的上午，红卫兵去过我伯父家，从他那儿拿到了我母亲的收条。事后听伯父说，这批人是通过武力的威胁，以抄家的形式，才取得的。姓陈的声嘶力竭地对我说：“这是你亲自落款的收据，你还有什么话好讲！”我回答说：“我每月工资79.50元，我自己留下9.50元另用，剩下的全部交给妈妈，作为家用。这份小数额的定息，也都是拿来补贴家用的，我本人没有从家中拿进半分文。”姓陈的又吼叫：“这些收据有你的盖章，铁证如山你还狡辩？

给我打！”又一次鞭打落在我身上，这次鞭打部位是在背上。此时我清楚地知道，他们已认定，我是一个拿定息的资产阶级份子，有我的盖章作为凭据。我无言以对，显然话越多，越遭打。文化大革命时期，“上体司”在上海滩是臭名昭著的打手组织，曾逼死过人。“上体司”的“胡司令”，在文化大革命的后半期，因为作恶多端，民愤极大，被判刑关入监狱

（听说判了十年徒刑）。钢筋铁骨造反兵团是“上体司”手下的得力助手。如今我落在他们的手上，如不承认，却辩解甚至否认，必定会遭到毒打，轻者致残，重者可能会丧命。我深知他们凶残的本性。一旦我有什么三长二短，家中孤独无助的妈妈，以及年幼的尚在中学念书的妹妹们由谁来照顾？定息是人民政府给的，是合法的额外收入，况且数目又那么少，我从不沾手，哪能成为资本家？即使算是拿了定息，又能把我怎么样？不如承认吧！免得遭受皮肉之苦。我也知道，一旦承认了，将会面对很多意想不到的苦难。就由我一个人来承担吧！在权衡得失之后，我承认拿了定息。在我承认之后，红卫兵即刻打开广播喇叭，通知风雨片所有人员到饭厅集合，开群众斗争大会。当我由两名红卫兵押送走进饭厅时却惊奇地发现，我的妈妈在众目睽睽之下，已跪在八仙桌上。原来他们早已预谋好，要开这么一场批斗会。他们兵分二路，一批人在办公室拷打审问我，另一批人奔赴我家，把我母亲从家中押送到我单位。看到母亲瘦弱的身子跪在饭桌上，浑身上下不停地颤抖着，可见她的内心，有多么的恐惧！我心痛如刀割，内心感到很愧疚。妈妈年龄已有六十多岁了，是个家庭妇女，平时基本上足不出户，如今为了生计，接受了人民政府的定息，竟遭到这么残忍的对待，这是丧尽天良、灭绝人性的恶行，实在令人发指！我与妈妈并肩跪在同一张饭桌上，共同承受着二百余人的批斗（当时与田径队在风雨片一起使用训练场地的，还有男女排球



全家福

队）。姓陈的代表田径队慷慨激昂地发表演讲，声称，“田径队的革命小将经过百般地努力，终于揪出了混进革命队伍内的资产阶级份子。跪在那儿的，就是党内走资本主义的当权派，人们曾欣赏的资产阶级孝子贤孙。如今我们把他揪出来，不仅要打倒他，还要踩上一只脚，叫他永世不得翻身！”他接着宣布三个决定：1) 解除我的教练工作，下场地劳动改造。2) 不得随意外出行动，每星期只能回家一次。回家之前要请示，归队之后要销假。回家之后，必须向当地的居委会报到，要打扫里弄的清洁卫生；归队后要汇报一天的作为。3) 每星期要写思想汇报，并交代问题。散会前有人为我剃了个“阴阳头”（所谓阴阳头，即把头中央的头发由前额剪向后脑，中间留成一条沟，把头发从中间分成一半。这是当时给一切被揪出来的“牛鬼蛇神”的标签。）我是一个刚从大学毕业不久的工程技术人员，为了国家体育事业的需要改行当教练，平时工作认真，积极钻研技术，一心扑在事业上。如今为了父亲因病辞世，每个季度，拿了人民政府几十元人民币的定息，竟然遭受如此的对待。天理何在啊！我的母亲，由于受到那次批斗大会的惊吓，以至于凡听到街上有锣鼓声，就会小便失禁。我的内心深感不平与怨气。我究竟错在哪儿？从那一刻起我就下定了决心，有朝一日，只要有办法，我要出国另找出路。这个社会容不下我。

——待续——

版权文章，未经许可，不得转载。